

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
台北：遠流出版社，2009。468頁。

簡宜君*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界中，陳寅恪享譽史學界，被傅斯年推崇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而傅斯年一手創立史學重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則被譽為「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胡適語），岳南在《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將二人合而論之，展現了別出心裁、引人入勝的敘事手法。全書採用雙傳記、雙主軸的架構，先以1926年陳寅恪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破題，吸引讀者目光，再採倒敘的手法，以兩人在1915年春夏之際，相識於北京大學為此合傳的起點，按時間先後順序記述兩位學人的際遇，而以1969年陳寅恪不堪文革風暴的摧殘，病逝於中山大學西南校區內的寓所為本書終章。眾所周知，陳寅恪與傅斯年對史學界皆有重大的影響，歷來學界藉由兩人的書信、詩詞分別所做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碩，不在話下，但尚無以此兩人同時為主題的傳記。因此，岳南所著之陳、傅合傳，可謂嘗試了一個新的著眼點。

《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共分十五章，描述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人的生平，大致可區分為四個階段，即放洋留學時期、黃金時期、抗戰南遷時期，以及海峽兩岸政權分立時期。前兩章〈風雲際會〉、〈江湖多風波〉，描寫兩人先後放洋的留學生涯與趣事。陳寅恪由於家庭財力優渥，於1902年至1905年間隨兄長兩度赴日，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前後為期近四年，1909年又自費前往

* 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專任助理

德國柏林大學、後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就讀，1914年返國後，又於1918年獲官費資助，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1921年始轉往柏林大學哲學系就讀。傅斯年則於1919年初次放洋留學，先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後轉往德國柏林大學。作者對這時期留學生們在異鄉勉強餬口過日、捉襟見肘的窘境，以及彼此之間密切交遊的情形有詳細的描述。

第三章黃金時期〈南北兩校園〉與第四章〈史語所的第一桶金〉，含括了自1925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約十二年的時間。此兩章描寫陳寅恪與傅斯年由海外學成歸國，將所學回饋社會，分別在中山大學、清華大學，一南一北大放異彩的黃金時期。陳寅恪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敬稱他是「教授的教授」；傅斯年則於1928年一手創立中研院史語所，成立次年取得內閣大庫檔案，使得史語所「聲光頓起」，後又因考古有成而聲威大震。

抗戰時期在全書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自第五章〈望斷天涯路〉開始、第六章〈南渡記〉、第七章〈中研院院長爭奪戰〉、第八章〈縱橫天涯馬〉、第九章〈與李莊擦肩而過〉、第十章〈西北望〉、第十一章〈千秋恥，終當雪〉，一直到第十二章〈魂返關塞黑〉，記載了隨著抗戰的爆發，政治學術重心不得不往西南大後方一再撤退的艱難處境。抗戰八年中時局混亂，物資短缺，加以通貨膨脹，民不聊生之苦翔實地反映在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人往返的書信、電文之中，幾乎無一信不提到如何尋覓謀生之道，無一信不訴說生活之艱困。

第十三章〈生別常惻惻〉、第十四章〈斯人獨憔悴〉與第十五章〈殘陽如血〉，記錄自1945年抗戰結束至1969年陳寅恪逝世這一段時間，隨著1949年海峽兩岸政權分立，飽受顛沛流離的兩位學人，再也沒有聚首的機會。傅斯年到了台灣，當上台大校長，陳寅恪輾轉到了嶺南大學，見證了馬列主義對學術自由所造成的傷害。

透過生動的敘事與逼真的人物描繪，讓清末民初學人的性格躍然紙上，可

說是《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最成功的地方。作者對傅斯年火爆而支配慾強烈的脾性，刻畫尤其傳神。書中不僅多次描述傅斯年怒氣衝天的模樣，更以「具梁山好漢的相貌與血性」且「心高氣傲，目空一切，待人接物具有泰山壓頂般磅礴氣勢」來形容他。除了傅氏書信中隱藏不住直來直往的性格之外，梁山好漢的血性可從這個例子看出：傅斯年留德歸國前夕，連連上書催促中國駐英公使館給付公費留學生匯款未果，因此怒而想要號召所有留學生，群起一把火燒掉中國駐英大使館，後在眾人勸說之下，始作罷論（頁 66-69）。而最能說明傅氏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磅礴氣勢者，則是如陶孟和所說：「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以及董作賓所說：「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頁 372）以「胖貓」與「小耗子」來形容傅斯年與史語所研究人員之間的關係，真是傳神，因而史語所在 1949 年「兵隨將轉」，整個所幾乎跟著傅斯年一起搬到了台灣，也不教人意外了。

相對於傅斯年外露的霸氣，岳南所呈現的陳寅恪，卻是一位曖曖含光、嚴謹自律的學者，一個行止得宜、不卑不亢、堅持個人學術理想的讀書人。作者呈現兩人甚為不同形象之同時，也表達了對兩人的觀感與評價。書的前半部，無論對陳寅恪的博學或傅斯年的過人才氣，都賦予正面讚美。到了後半部，陳寅恪完美形象依舊，即便是身處 1949 年後的中國，仍舊堅持「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的理想（頁 450），治學理念始終如一。然而對傅斯年的評價則是急轉直下，由原先讚其才氣縱橫轉而對其開創的學閥作風深表不滿，甚至指稱：「一代代大小學閥在大陸與台灣各高校、科研機構相繼產生，並為此爭奪地盤、搶佔地位、拉幫結派稱王稱霸，……與傅斯年創設的這種人事制度與政治格局是大有關係的。」（頁 373）史語所研究人員的確皆由傅斯年仔細挑選拉拔，他們對於傅斯年「敬畏」多於「敬愛」，也是事實，但是過度誇大傅之跋扈，並進而將一些學術界醜陋的亂象全數扣在傅之頭上，不僅言過其實，而且失之公允。

依筆者看來，作為一本雙人傳記，顧名思義必然是以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人

的生平作為主線，雙軸交錯譜成，以此而有別於個人傳記。岳南的這本《陳寅恪與傅斯年》，時間軸是抓緊了，敘事也流暢生動；不過，書中對於陳、傅二人接觸過的同時代學人有過多節外生枝的敘述，無論是胡適、蔡元培，一起留學的羅家倫、俞大維、陳思源、吳宓與徐志摩，或是其他名號響亮的民初學者，諸如魯迅兄弟、朱家驊、趙元任與楊步偉夫婦等人，不但皆有詳細的身家介紹，甚而連男女關係的糾葛也交代得一清二楚。配角的來龍去脈固然不能偏廢，但可惜的是兩位主角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反而顯得薄弱。一方面旁枝固然模糊了主線，另一方面實因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人之間原本就不存在那麼多的關連，即使要深入論述，也難為無米之炊。作者似乎僅憑兩人人脈網絡的若干交集點以及彼此往來的書信與電文，就將兩人湊在一塊合傳，以致於使《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缺乏雙傳記、雙主軸交錯譜成的堅強主線，反倒更像是一部民國學人的軼事雜燴。

此外，全書比重分配也顯得不夠均衡，內容也不夠深入。一本好的傳記，宜完整呈現傳主的內心世界與外在行為，並兼顧其理性與感性層面的鋪陳，但岳南此書對陳、傅兩人的情感世界著墨甚少，有關兩人愛情與婚姻家庭的敘述，加起來也不及俞大維一人在德國留學時的風流韻事所佔的篇幅。岳南採用雙人傳記的寫法，雖然開拓了一個新的切入角度，但故事的架構與內容仍是傳統的，側重兩人理性、學術層面的發展，情感世界幾乎空白，未能照顧到傳主內外兩個世界之間的平衡。此外，時間比重的分配也不太恰當，全書所述自1915年至1969年，前後五十幾年的歲月，其中抗戰八年竟佔了該書近一半的篇幅。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雖非歷史科班出身，但書中引用大量史料，考證功夫一點也不含糊。比方說陳寅恪在1949年時去留的抉擇，歷來說法不盡相同，作者採納了陳寅恪在文革期間自白「願留在國內」的說法後（頁446），又於註釋補充說明不同觀點的出處，以供讀者自行判斷。行文間尚可知作者的意識形態，如批評「決不會當共產黨」的傅斯年為「帶著花崗岩頭腦兒見上帝去的

典型人物」（頁 295）云云。儘管如此，全書敘事多半仍能根據史料作持平之論。

總之，岳南所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作為合傳雖有諸多缺陷，但仍可視為認識清末民初學人風格的佳作。一方面因為涉及的人物眾多，幅度夠廣，另一方面因為時間軸夠長，再加上作者大量引用日記、書信等材料，運用幽默的敘事筆法，呈現出學人們生活化的一面，即便是歷史學的門外漢，閱讀起來也絲毫不會感到吃力，因此仍然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傳記讀物。